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日出之前

(乌克兰)左琴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日出之前

[乌克兰]左琴科 著
赵小鹏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日出之前》的作者左琴科（1895—1958）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父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可惜早早去世，所以他虽然名义上是贵族出身，却家境清贫。左琴科性格敏感而忧郁，爱好文学，少年时期便开始创作短篇小说。1921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彼得堡丛刊》上发表。

他的作品共汇集成三卷文集，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日出之前》是“他毕生最优秀，最成功的作品”。这是一部用三分之二的篇幅，以纤细的笔触探讨科学，特别是心理科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作艺术描述的科学文艺小说，全书共十三章，约二十二万字。前六章发表于1946年，后七章发表于1972年第三期《星》杂志，名字叫《关于理性的故事》。1987年，苏联文艺出版社将上下两部恢复原名《日出之前》，收在他的三卷集中出版。

作者本来准备用《幸福的钥匙》作为小说的题名，发表前夕改用德国剧作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剧本名《日出之前》，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要以这部小说与霍普特曼的那个剧本“争论”。

作品以倒叙手法追忆了自己三十岁之前，即作者最终确立人生观之前所经历的一百十三桩大大小小的事。在大约一半的篇幅中，作者企图从巴甫洛夫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长年占



日出之前

据在他心中的悒郁、焦灼和恐惧的起因，却一无所获。于是他逐一解析自己三十年来多次做过的怪梦和噩梦，把他的记忆上溯到了婴儿期，终于找到了病源。原来是水、手、乳房、雷击这四个条件刺激物在他儿时的头脑里牢固地形成了错误的条件神经联系，以致这么多年来一直激起他貌似合理的条件反射，即自卫性反射。

当他依靠这个原理，通过精神分析学所提示的办法，终于找到他久治不愈的病根之后，病便痊愈。从此他便充满激情地投入到创作活动之中。他认为人只有经常净化心灵、克制欲念，才能够战胜衰老与痛苦，度过长寿的有意义的晚年，使生活不再孤单寂寞。

左琴科既擅长写讽刺小说，享有幽默大师之称，而且还创立了“科学文艺小说”这一新形式。他走过的这条创作道路在僵化、专横、教条的氛围下被视作异端，于是不断地遭到批判、辱骂、攻讦，以致《日出之前》被查禁，连他早期写的一系列名作也一概绝版，最后生活无着，备受神经官能症的折磨，在贫病交困之中，精神崩溃，无法进食而死。



目 录

序	(1)
楔子	(3)
我不知道我不幸的根源	(8)
萧萧落叶	(21)
可怕的世界	(107)
日出之前	(157)
黑水滔滔	(181)
把门关上	(197)
老虎来了	(222)
危险的联系	(241)
理性是祸患”	(268)
理性战胜死亡	(299)
战胜痛苦	(315)
理性战胜衰老	(328)
尾声	(335)
跋	(340)



序

很早以前我就想写这本书了。在我的《重返的青春》刚一问世的时候，此念便已萌生。

为这部新作搜集素材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一直在等待战事结束，天下太平，以便使我在书斋宁静的氛围中坐下来写作。

但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氛围。

相反，在我这些素材附近德军的炸弹曾经两度爆炸。石灰和砖块纷纷落到放着我手稿的公文包上。火焰差点烧毁了这些手稿。但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些手稿怎么会保存下来。

我带着我所收集的素材坐上了飞机，由被围的列宁格勒出发，飞越德军的封锁线。

我携带的记事本一共二十册。为了减轻它们的重量，我把封皮都撕了。可它们仍有八公斤重，而飞机只允许携带十二公斤的行李。事后我曾非常后悔，怎么不带一双供替换用的靴子和几条绒布衬裤，而带了这么一大摞废物。

对文学的爱终于胜利了，但是，我对我不幸的命运，一点也不懊悔。

我的手稿被装在一只破烂的黑公文包里和我一起来到中亚，来到了如今成为我幸福巢穴的阿拉木图。



日出之前

有整整一年时间，我在这座城市里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岁月创作很多所需要的剧本。

我带来的素材放在木制的沙发床里，我晚上就睡在上面。

有时我掀开我的沙发床的木棚，在胶合板的底板上，那二十本记事本连同一袋面包干静静地放在一起。面包干是我按列宁格勒的习惯提前烘制好的。

我翻阅着这些记事本的时候，一种遗憾苦涩的心情油然而生，因为开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到来，因为，现在不需要这种东西，它离战争太远了，炮弹的啸声离大炮的轰鸣太远了。

“没关系。”我安慰自己说，“战争一结束，我马上动手写。”

我那些记事本又放回沙发床的底板上。随后我躺到沙发床上，在心里估计战争结束的时间。我估计的结果是悲观的。那么究竟何年何月正是我所无法确定的呢？

“可是为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到来呢？”有一回我这么想，“应该明白我的素材是讲人的理性的胜利，是讲科学，讲意识的进步。我的作品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哲学’的，因为后者认为意识会给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人的幸福在于回到原始，回到野蛮期，在于舍弃文明。”

因此，正是此刻阅读这部作品较之今后有更大的意义。

1942年8月，我把我的材料放到桌上，不等战争结束便动笔写这部作品了。



楔子

抱着良好的愿望演奏吧！

演员的演技是不予苛求的。

十年前，我完成一部中篇小说，名字叫《重返的青春》。

这是一部大多数作家都是这么写的中篇小说，然而不一般的是我在小说中加进了不少诠释——探讨都属生理学性质的。

这类探讨目的就在于解释小说主人公们的行为，向读者提供有关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的若干信息。

《重返的青春》并不是供科学界人士阅读的，然而正是他们对它特别感兴趣，召开了许多讨论会，进行了讨论，其中有好多挖苦的话，但也有说好话的。

使我大为窘迫的是科学家们竟那么热烈，那么认真的同我争论。这不是因为我知识渊博（我是这么想的），而是由于我涉世不深而敢于触及科学界没有充分触及的那些问题。

不论是挖苦我的还是说好话的，科学家们与我交谈时，几乎都把我视作是他们的同行。“脑科研究所”甚至多次要我出席会议。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还曾经邀请我去参加“巴甫洛夫星期三”。

因而我有必要再次声明：我写的并非是科学著作，而是一部文学作品，科学素材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



日出之前

令人奇怪的是，画家在画人体之前，必须先学解剖学。掌握解剖学的知识，目的是为了在作画时避免出错。作家要描绘的不仅是人体，还要描绘人的意识，人的心理，却很少去追求这些方面的知识。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要学点儿东西，并与读者分享学习心得。

于是我写了《重返的青春》。

但是十年之后，我清楚地看到我这本书的偏颇之处，有不少地方不能自圆其说。看来过去为此我受到的责骂还不够厉害。

1934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

在谈到我这部作品时，他说：“虽然我也承认您写的东西是应当写的，但是我宁愿读您写的普通的短篇小说。研究人的意识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我觉得恐怕更大程度上是作家的事。我是生理学家，所以我不怕说出这一点。”

我回答他说：“的确如此。意识的领域，高级心理活动的领域，更大程度上属于文学家，而不是科学家。人的行为可以而且应当借助于柳叶刀和狗的帮助加以研究。然而人有时会出现‘幻觉’，而即使在同一刺激物的作用下，幻觉也会以异常的方式改变感觉力度。因此，有时就有必要分析狗的条件反射，以便摸清其错综复杂的幻觉。而要如此就非我们莫属了。”

科学家微笑着，说道：“您的话有正确因素，不过刺激强度和反应的对比往往因人而异，更何况在感觉范畴内。如果您试图涉及这个领域，那么就会在这里同我们相遇。”

几年以后，这位生理学家获悉我在写一本新书，便请我把书的梗概讲给他听。

我说：“简而言之，这本书写的是我怎样摆脱不必要的忧



伤，从而走向幸福。”

“这是论文还是小说？”

“是一部文学作品。科学融入这部作品就像历史有时融入小说一样。”

“而且还将插入大量的诠释吗？”

“不。这将是为了结构完整，一如大炮和炮弹可以成为完整的统一体。”

“那么这部小说将以您为原型了？”

“有半本书将写我自己。不瞒您说，这使我非常难为情。”

“是您的私生活吗？”

“不，更糟糕。我将要讲的那些东西应当写进小说的。我聊以解嘲的是那是总结我年轻时代的。这就跟讲死人的事一样。”

“您将写到什么年纪？”

“三十岁左右。”

“再加十五年吧！那样更好，您的书将更完整，谈了您的一生。”

“不，”我说，“因为自三十岁后我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已不适合写进我的作品。”

“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这甚至不是用变故二字可以形容的，出现了一种与过去截然相反的生活。”

“是吗？这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吗？”

“完全不是。我运用了巴甫洛夫的原理，这是他的思想。”

“那么您本人起什么作用呢？”

“我的作用实际上非常简单：我驱除了妨害我的东西——



日出之前

我意识中产生的错误的、不正确的条件反射。我驱除了这类条件反射之间的错误的联系。我驱除巴甫洛夫所说的‘暂时性联系’。”

“用什么方法？”

当时我尚未考虑充分，因此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还是讲了我的极其含混的原则。

科学家沉吟好一会儿，回答说：“好吧。只是千万别诱使人相信任何东西。”

我说：“我会小心行事。我只让人相信我已证实的东西。而且只让个性与我相近的人相信。”

科学家大笑着说道：“这样的人不会太多才是正常的。譬如说吧，托尔斯泰的哲学只对他本人有用。”

我说：“托尔斯泰的哲学是一种有助于他的信仰宗教而不是科学。我同宗教背道而驰。我谈的既非信仰也非哲学体系。我谈的是由一位科学家所验证的公式。我所起的作用是渺小的：我根据我的生活实践证实这些公式，把我认为没有联系起来的東西加以联系。”

那次谈话之后，再也没见到过那位科学家。大概他以为我由于力不胜任搁笔了。

实际上，我已在上文奉告各位，我在等待战事平息，太平年代到来。

然而战事一直没结束，这是非常遗憾的。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我写得很不顺利。作品的美感无疑大为降低，心灵的激荡影响作品的风格，焦虑使知识趋于贫乏。明明心绪不宁，却误认为不过是下笔匆忙。而这一切势必授人以柄，被视为草率地对待科学，视为对科学界的大不敬……



科学家！

若你看到我哪句话失之偏颇，

请你用如椽巨笔勾掉它。

但愿有教养的读者原谅我的简陋和粗鄙。



我不知道我不幸的根源

啊，可悲！回避灿烂的阳光，
到监狱里去寻找欢乐，
凭着一盏孤灯的光亮……

一回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我就感到惊讶，我那时那么忧伤，那么多愁善感。

最美妙的少年时代被涂上了黑漆。

我在童年时从来没有这样郁郁寡欢过。

但是刚一步入青年时代，一种难以形容的莫名的愁思就如阴云一般笼罩着我。

我认为生活会给予我欢乐的，便竭力去靠近人们，寻找欢乐、爱情、朋友……然而我并没有在其中找到丝毫安慰。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一切到了我手里就黯然失色。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根源。

当我十八岁时，自以为找到了解释。

“世界多么可怕，”我那时这么想，“鄙俗的人们。他们的言行举止滑稽可笑。我可不是那样。”

索福克勒斯的四句诗贴在我的书桌上方：

崇高的天赋绝不会栖于凡躯，



如果你见到日光照亮寰宇，
啊，赶快踏上归途，
回返那亲切的故居。

我知道当然还有不少人对生活抱着乐观的，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态度。但是我瞧不起那些在刺耳、鄙俗的音乐下仍然兴致勃勃跳舞的人。这种人还处于动物和野人的水平。

周围的一切，都坚定了我的这种观点。

诗人为自己写的缠绵悱恻的诗而自豪。

“伤感袭上了我心头——是我白发苍苍的祖母，她是我的圣母。”我记不起反复吟咏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

我所倾慕的哲学家们对忧郁症的评价是值得敬重的。康德说：“具有崇高的感情者患忧郁症。”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忧郁的气质有才华并有助于深刻思考。”

把劈柴添进我篝火中的不仅仅是哲学家和诗人。在我那个年代，忧伤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人的特征。在我那个圈子里，凡是忧郁的、沉思的、甚至厌世的人都倍受尊敬。

总之，我那时认为对生活持悲观态度乃是感情细腻、善于思索、出身贵族的人应当持有的正确态度。而我正是贵族出身。

所以我认为患有忧郁症是正常的，我的某种程度的厌世正是我智能的特征。而且不只是我一人智能的特征，而是一切力求使自己的意识高于动物的意识的人的特征，是一切同类人的智能的特征。

如果确实如此，那就非常悲哀了。然而看来差不多。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肤浅的思想，粗鄙的感情，总是无往不胜。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为结局。



日出之前

十八岁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是如此。

但是这样想是错误的，我这样想是犯了可怕的错误。现在我怀着幸福感向各位宣告：

当初这个错误险些送掉我的性命。

我看不到其他出路，因此那时我想死。

1914年秋天，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离开大学，加入军队，准备以死报国，避免死得轻于鸿毛。

但是在战争中我反而不再忧伤了。在枪林弹雨之下，即使忧伤偶尔袭来，很快也就过去了。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几乎是幸福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觉得是我在战场上找到了生死与共的袍泽，致使我不再忧思重重，这有一定逻辑性。

我在高加索近卫师米格列尔团服役。官兵亲如手足。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也许这只是我这么觉得。

我十九岁时已擢升为中尉。

二十岁时晋升为大尉，已有五枚勋章。

但是这并不说明我是个英雄，而是说明我整整两年没有离开过前线。

我参加了许多战斗，受毒气伤害，挂了花，心脏出了毛病。然而我几乎始终是愉快的。

革命刚爆发时，我就回到了彼得格勒。

我没有丝毫恋旧的伤感。相反，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崭新的俄罗斯，跟我所熟悉的苦难重重的俄罗斯完全不同。我希望周围的人都是朝气蓬勃的，健康的。而不要像我那样动辄多愁善感，郁郁不乐，忧从中来。



任何所谓的“社会分歧”我没有感觉到。可是我又回到忧郁的时代了。

我试着调换城市和职业。我预感到这忧郁将置我于死地，我想逃避这种可怕的忧郁。

我先迁居北冰洋畔的麦津。继而又迁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后来又回到彼得格勒。不久，又前往普斯科夫。后又迁诺夫哥罗德。此后又搬到斯摩棱斯克省的红城。最后还是回到彼得格勒……

忧郁始终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不管我迁往哪里。

三年之内，我换了十种行业和十二个城市。

我当过皮匠、会计、民警、边防警卫部队电话员、家禽养育家、法院的书记员、刑事侦察员、文书……

我不仅没有坚定地生活道路上行进，而且——张惶失措。

在纳尔瓦和亚姆布尔格附近，我参加了红军，又重新在前线度过了半年时间。

我必须考虑新的职业，我的心脏被毒气损伤了。

1921年，我开始写作。

此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然而忧郁却一如既往。而且，它光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除了忧郁之外，我的心脏有问题，胃有问题，肝也有问题。于是我去找医生。

医生们大胆地给我治疗。

对于后三种病，他们用水和药丸来给我治疗。内服外用双管齐下。

而对于忧郁，他们决定四面夹击的将它逐走，同时从后